

九江首个虚拟动画主持人播新闻： 春运这么走不堵又安全

2019年春运从1月21日开始至3月1日结束,共计40天。小伙伴们会发现每年春运期间咱们九江就会堵堵堵!掌中九江从九江交警处了解到,结合我市快速路实际,他们对春运期间九江市城市快速路相关交通情况进行公布和提示。现在来看看我们的虚拟动画主持人是怎么说的



用QQ或微信扫一扫上图,看虚拟动画主持人为您说新闻

交通安全提示:
1.合理规划、选择出行行车路线,①长江桥虽然开通,但通行能力有限,建议货车在春运期间从长江二桥通行,②九江市城区通过快速路上下班的驾驶人朋友,建议春运期间避开快速路,经由市区其它道路通行;
2.如遇九江东至九江站内快速路出现交通拥堵,建议往来九江城区小型客运车辆可由新港互通、姑塘高速口进行分流进入市区,建议过境的货运车辆及其它车辆可选择新港互通及都九互通途径九江绕城高速前往南昌或景德镇方向;
3.轻微车肇事事故快速撤离现场,驾驶人及乘车人在车辆撤离现场前应离开车辆,转移到路边安全地带。

航拍九江火车站广场部分设施已投入使用,进火车站可以这样走



用微信扫一扫,看九江火车站航拍视频

“1月16日,已经交付了,广场和地下通道这一块已经全部完工,公交车道、社会车辆和出租车今天可以投入使用。”九江火车站广场项目部工程师赵晨阳说。
在九江火车站广场,掌中九江记者也看到,目前,所有车辆还不能进入广场内。在长虹大道辅道的出租车候车点处,市运管局执法人员正在引导出租车有序停靠、上客。
除了火车站上广场,从21日起,下广场,庐山南路桥洞路段(庐山南路大转盘至火车站下小转盘),长虹大道南侧下火车站匝道(长虹大道下火车站小转盘及火车站小转盘上长虹大道路段)也已经恢复了通行,不过地下停车场暂时还未投入使用。“地下广场的车库工程,目前还未完工,预计要到年后。”届时,乘客们出站后可从广场下楼梯或者乘坐扶梯至地下车库乘坐出租车,私家车等也可在地下车库停放。

1月21日,历时四个月的九江火车站广场改造工程,在春运首日,部分设施正式投入使用。
当天上午,在九江火车站广场,掌中九江记者看到,原先在被围挡起来的广场区域,围栏已基本拆除,行人已经可以自由通行。



微信评选是一种游戏,政府部门不该凑这种热闹

“建议取消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通过微信投票评选先进单位、个人的做法。”1月22日,杭州市政协委员胡芳对媒体表示,她向正在召开的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交了相关建议。她认为,现在各类微信评选活动繁杂,部分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在集体或个人荣誉竞争中借助微信投票,但这种非正式的选票缺乏公平性。
估计每个人都遭遇过“朋友圈投票”的难受,面对各种的拉票、亲友的托付,若不帮忙,很可能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这样的“忙”,一个是不好帮——

每个都需要花时间注册,再一个是,这种几无意义的“投票”,给人俗不可耐之感。网上有个“微信朋友圈几大恶俗”的评选中,微信评选、朋友圈拉票都赫然在列。
微信投票,不知何人发明,但这种既不合理也不公平的俗套“游戏”,却能流行多年经久不衰,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那些评选活动组织者到底是怎么想的——朋友圈里的“票”能说明什么、代表什么?这是“最有趣的问题”。谁都知道,朋友圈里的“投票”主要是拼关系,人脉越广的,获得的票数肯定越多,投票

的人只看关系,才不管被评选人出色不出色、先进不先进。而组织者明知道是这回事,仍执意让朋友圈做主,到底是在搞评选,还是“玩评选活动”呢?
关于微信评选的理由,曾有组织者坦言“现在不都是这么弄吗?”这种逻辑恐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有些恶俗的东西所以俗而不衰,还被趋之若鹜,就因为不少的人都信奉“流行的就是好的”、“延续下来的就是对”。这种逻辑的另一种解释是:跟在别人后面走,最省力最安全。
最不可思议的是,一些政府部门甚

至高等院校也不能脱俗,将一些评优、选先进的活动拿到微信圈里去“票评”。而且还出现过公共部门发红头文件倡议市民支持某某候选人的“笑话”。这种官方榜样效应,是否也推波助澜着社会上的“朋友圈拉票恶俗”?
因为微信投票越玩越火,还催生了“微信圈拉票经济”,一些所谓的文化传媒企业从中嗅出商机而变身“刷票公司”。在网上,“专业投票,8000元保第一”之类的广告铺天盖地,投票游戏升华为烧钱游戏。这也标志着,投票造假进入了“无遮羞布时代”。

直抒己见

放下手机 父母们听听孩子呼吁
“爸爸每天都从吃饭、起床、睡觉等时间来玩他的宝贝——手机,好像没了手机就活不下去了;又像一只饿了三天三夜的恶狼正盯着一块又大又肥的肉一样……爸爸,只要您能放下手机,我愿意用东西换,哪怕是您的生命。”这段话摘自洛阳9岁小学生的一篇作文。父母没有节制地玩智能手机,首先是对自己的身体有害。再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如此偏爱手机,不务正业,天长日久,也会形成对孩子不良习惯的影响。所以,年轻的父母们,千万别把自己玩手机看成小事了。(贾合祥)

对地铁“凤爪女”真就束手无策了吗

有媒体报道说,20日晚,一女子乘坐北京地铁13号线时在车厢里进食,残渣掉了一地,还把袋子扔到了地上,这种行为引来公众谴责。有人辨认此地铁吃主与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上海地铁吃凤爪的女子高度相似。
不过,最令公众不解的是,对这种寡廉鲜耻、明显违背公德的行为,地铁运营方却表示无能为力。上述报道称,北京地铁工作人员表示,乘客在地铁上吃东西并乱扔垃圾的行为,属于个人素质范畴,并不能用强制手段进行约束,“地铁工作人员没有处罚权”,并且,“因为不少乘客有低血糖,这给地铁内禁止饮食带来了一定难度”。

在地铁上吃东西并乱扔垃圾的行为,的确与个人素质相关。但是,当因个人素质所致行为与公序良俗发生冲突时,这种行为也就不再局限于个人素质的范畴,而成为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问题。对于在地铁车厢里发生的一些由个人素质所致不良行为,“地铁工作人员没有处罚权”,地铁运营方“不能用强制手段进行约束”,这都不假。但是,除了“处罚权”,除了“强制手段”,地铁运营方和地铁工作人员对类似影响公众利益的不良行为真的就束手无策,真的就可以放任不管吗?难道个人素质养成、公共道德培养以及公序良俗的形成,都要靠赋予有贵方以“处罚权”以及行使“强制手段”的权力,非此就

不能维持一个良好的公德状态吗?难道劝告、说理就真的毫无用处吗?
至于有人提出现行《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并没有禁止在地铁内饮食的规定之辩,其实也是强辩之词。许多因个人素质而致不良行为,比《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所列举的不良行为还要等而下之,这些不可为之事已是社会公德的默认禁忌,一个“守则”不可能将其尽列其中。因此,并非守则未列入的行为就是可以放任的行为。而“低血糖”一说,就更是难以成立。那些明确规定在车厢内不可饮食的国家和地区的地铁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运营方,难道就没有考虑到低血糖乘客的需要,难道那么不体贴乘客?

实际上,地铁乘客中,有低血糖的乘客并不稀奇,有不顾脸皮违背公德的乘客也不稀奇,问题在于当这样的乘客出现时,作为对此负有责任的公共交通工具的运营方——尽管没有“处罚权”和“强制手段”,都应该有针对性地应对措施,为乘客提供必要的服务或制止乘客的违反公德公序的行为。由上述报道,一个连乘客都出面予以谴责和制止,违反公德的行为人显然也自知行为不当而换了车厢的事情,到了本该对此负有责任的地铁运营方那里,怎么反倒对这种违反公德的行为显得那么大大,那么宽容了呢?这种大度和宽容,又将那些敢于出面谴责和制止这种行为的乘客置于何地呢?以这种大度和宽容,如果有乘客因为出面谴责和制止此种行为而与违反公德者发生了冲突,那么,这样站出来的人是不是最终也要挨上50大板呢?
社会公德的大面积溃烂往往始于人们并非不可以忍受的个别“小事”。在此,对公序良俗负有维护、维持责任的机构,其对于这种“小事”的态度及其应对,对社会公众尤其具有示范作用。如果今天认为吃得一地渣子的乘客是因为“低血糖”,那么明天就会原谅对机器器官控制力尚弱的孩童随地便溺,再后还可把更加严重的违规行为归结为“心情”。而社会公德就是在这种大大度和宽容的脚踢恶恶化至溃烂而积重难返。(光明评论)

意见领袖

“中产”是一种生活状态

寓言中说:一个大富翁去海边度假,沐浴日光浴时看见了一个穷苦的渔民,觉得很可怜。渔民却问他:你这么多钱,能得到什么?大富翁回答:我尽管工作辛苦,但总算能挤出些时间,在吃饱喝足后,惬意地躺在海边晒太阳。渔民回答:我饿了就下海捕鱼,吃饱以后,可以天天躺在海边晒太阳。

强调:“中产”是一种生活状态。那样一种生活状态是:不仅收入、消费水准,且休息时间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后,有充分的时间休息,与家人一起享受生活。不富贵,不超前,但惬意。

古典诗词中,征夫泪、春闺怨的背后就是这样一种情怀。那么,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民众一定会问:谁夺走了我们的幸福生活?既然有命赚、没命花,赚钱的意义何在?

那么,“中产”就在概念上与各项劳动制度,包括休假制度、最低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福利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制度,包括监督约束权力、杜绝浪费等等链接。上述任何一种制度出了问题,必然人为导致多数民众不能较好地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生活在真正的“中产”状态。

这些天,人们又在讨论: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有4亿“中产阶级”人群。这里,我无意争论具体的人数,只是

国内舆论圈内,所谓“华为文化”一直是众矢之的。大家不否认华为公司的待遇高,但无论华为公司的真实用工情况如何,总之,经各种报道层积,早已使在华为上班必须拿命拼成为舆论圈内的既定形象,那么,大家一定会提出问题:有命赚钱,是否有命花?这样一个问题并非仅仅针对真实的或虚拟的华为公司,而是针对整个社会制度、社会运行方式的拷问。
千百年来,在中国人的心底,或者说四海列国之人的心底,都以人的幸福生活为社会运行的终极目的。在中国的

社会,个人摆脱极度匮乏之后,不会只想挣钱,不会只想物质生活,一定会“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精神文化需求”的基础是时间。
国人的舆论圈内,所谓“华为文化”一直是众矢之的。大家不否认华为公司的待遇高,但无论华为公司的真实用工情况如何,总之,经各种报道层积,早已使在华为上班必须拿命拼成为舆论圈内的既定形象,那么,大家一定会提出问题:有命赚钱,是否有命花?这样一个问题并非仅仅针对真实的或虚拟的华为公司,而是针对整个社会制度、社会运行方式的拷问。
千百年来,在中国人的心底,或者说四海列国之人的心底,都以人的幸福生活为社会运行的终极目的。在中国的

家庭至少是买得起房子的,是能够让家电、家电齐全过渡到出入有车的。且中产劳动者的收入主要来自单位时间段内努力工作,而非加班。
那么,“中产”就在概念上与各项劳动制度,包括休假制度、最低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福利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制度,包括监督约束权力、杜绝浪费等等链接。上述任何一种制度出了问题,必然人为导致多数民众不能较好地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生活在真正的“中产”状态。
各级部门强调并运用一种概念,必须让民众信服。如果这概念落实为数据,这数据一定是细致严谨的,反映了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概念清晰,不刻意偷梁换柱;数据细致严谨,便是善治、善政的开端。(三 丝)